

陈述先生与《辽史补注》

口述/刘凤翥 李锡厚 林荣贵

《辽史补注》是辽金史专家陈述先生以六十年时间对“二十四史”之一的《辽史》进行全面订补的长篇巨著,也是当代辽史研究不可绕过的重要资料。该书成书日久,因种种缘由,去年底才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。近日,陈述先生的硕士研究生、同为辽金史领域研究者的刘凤翥、李锡厚、林荣贵三位先生,与《辽史》修订组成员和中华书局诸位编辑在伯鸿书店举行座谈,回顾跟随陈先生读书的往事以及他们所了解的《辽史补注》。

刘凤翥:我和锡厚、荣贵既是北大(历史系)同学,又都是陈述先生的研究生。这次借着这个机会,我们一起缅怀先师陈先生,学习先师的皇皇巨著《辽史补注》,这确实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饮水思源,我们首先应当有一颗感恩的心,感谢陈先生把我们领进辽金史这一学术领域,使我们在这一领域得以驰骋发展,不断取得学

术成就,实现人生价值。

根据日记,我是1962年5月17日报名考陈述先生的“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史专业”研究生的。当月23日(星期三),在考研究生之前,首次拜谒陈先生。那天晚上,我冒昧地去先生府上拜访。先生愉快地接待了我。他对我说:“学问的事必须一步一步地来,不能期望一锹就能掘一个井。”他还说: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历史规律,如果不胜于蓝学术就不能向前发展了。”我问他考研究生应当看哪些参考书。他说没有什么特殊要求,都是

你们学过的,看看讲义或教科书就行了。我说好多中国通史课没有讲义,也没有教科书。他说翻翻听课笔记也行,既然你报考的是东北古代民族史,就不会太远了。我意识到陈先生给我划了考试范围。初次见面,他对晚辈的关怀和平易近人的长者风范给我留下了美好记忆。

当年我在包头市度暑假。9月4日,接到杨明新同学的来信。我当天的日记中有:“信中通知我说,我已考取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陈述教授的辽金史研究生。这真出于我的

意料之外。……我应该好好地跟陈述先生学习,为民族史做出贡献。”9月18日,我报到后,陈先生让我逐字逐句地仔细阅读《辽史》《金史》《元史》,有问题随时问他。他不仅言教,也不时身教,例如在一个盛夏的某天,我去他家,我敲门,他揭开门上瞭望窗的布一看是我,就说:“你等一会。”原来他穿着短袖背心,进去穿上中山装,系好扣子再来开门,当时我不理解大热天的为什么还穿上中山装?后来我明白

(下转4版) ➔



陈述先生留影

◀ (上接2版)

可。’怀王曰:‘许仪而得黔中,美利也。后而倍之,不可。’故卒许张仪与秦亲。”

但同样是屈原劝楚怀王杀张仪,《史记》的记载是自相矛盾的,在《楚世家》和《屈原列传》里有不同的说法。《史记·楚世家》:“张仪已去,屈原使从齐来,谏王曰:‘何不诛张仪?’怀王悔,使人追仪,弗及。”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:“是时屈平既疏,不复在位。使于齐,顾反,谏怀王曰:‘何不杀张仪?’怀王悔,追张仪不及。”对比《张仪列传》,《楚世家》《屈原列传》所讲述的内容差异之处有二:一是增加了屈原使齐而返的细节;二是怀王后悔,只是张仪已去,追之不及。尤其是第二点,明显与《张仪列传》中怀王坚持采纳张仪之说相悖。这个情节被《资治通鉴》删去,很有可能是《史记》自相矛盾的缘故,且删去之后并不影响之后的故事进展。故事最终是按照张仪设计的套路走的,司马光采用了《张仪列传》作为史源,于是屈原失去了第一次出场机会。

元代学者李冶在《敬斋古今甞》卷三中对《史记》有这样一段评论:

《屈原传》原劝楚怀王杀张仪,其事纤悉备书。然《楚世家》载劝杀张仪者乃为昭雎,而

屈原不复见。若以为简策繁多,要使姓名互着,则在《左氏春秋传》有之,在《迁史》故无此例。若以为昭雎本主此事,原特副之,则《屈原传》略无昭雎一言,而原之事迹明白乃尔。两者皆无所据,何耶?此盖旧史去取失当,司马迁笔削时不暇前后照顾,随其所载,各自记之,遂使《世家》与《列传》异辞。按,《史记》无昭雎劝怀王杀张仪事。《世家》与《列传》异辞者,乃谏怀王入秦事,即下文将提到的屈原第二个可能的出场机会,李冶误记。

《资治通鉴》周赧王十六年(B.C.299)第三条,秦昭王诓骗楚怀王入秦,楚大臣昭雎劝怀王勿行。在此,司马光取的是《史记·楚世家》中的说法。《史记·楚世家》:“楚怀王见秦王书,患之,欲往,恐见欺;无往,恐秦怒。昭雎曰:‘王毋行而发兵自守耳。秦虎狼,不可信,有并诸侯之心。’怀王子子兰劝王行,曰:‘奈何绝秦之欢心。’于是往会秦昭王。”然而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却说:“时秦昭王与楚婚,欲与怀王会。怀王欲行,屈平曰:‘秦虎狼之国,不可信,不如无行。’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,奈何绝秦欢。怀王卒行。”

劝怀王勿入秦的究竟是谁,《史记》本文内有两说。关于这一点,上文曾提及,黄汝成也注意到了,他认为《通鉴》将此事属昭雎而不属屈原,乃是“脱

漏”。这个判断恐怕有些武断。纪传体史书中,纪传异词是常见现象。在没有相对合理的证据、理由判定哪一说更为准确时,比较谨慎的方法是暂采本纪,这似乎是很多史学家在实践中常用的方法,《通鉴》亦有此例。如卷五周赧王五十一年(B.C.264)“秦武安君伐韩,拔九城,斩首五万”条,依据的是《史记·秦本纪》的记载:“(昭王)四十三年,武安君白起攻韩,拔九城,斩首五万。”而《史记·白起列传》所载这次战争的战果是“拔五城”,并非九城。

然楚国为战国之一,在《史记》中没有本纪,但我认为《楚世家》相对于《屈原列传》等楚国名人的传记而言,发挥着与本纪统摄列传相等的功能。这样理解的话,《楚世家》的史料等级当优先于《屈原列传》。《资治通鉴》前六卷关于战国的叙事中,是否有其他取世家而舍列传的例子?有,且仍可以《史记·楚世家》与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的差异取舍为例。《资治通鉴》卷三赧王三年(B.C.312)春,“秦师及楚战于丹阳”条叙事,乃综合《史记》中的《秦本纪》《楚世家》《张仪列传》等文献而成。其下文有“韩、魏闻楚之困,南袭楚,至邓。楚人闻之,乃引兵归”,即采用《史记·楚世家》之文。此事在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中被表述为:“魏闻之,袭楚,至邓”,少了韩国的参

与,也缺乏对楚国应对措施交代,不为《通鉴》所取。

又如卷四周赧王三十七年(B.C.278)第一条:“秦大良造白起伐楚,拔郢,烧夷陵。楚襄王兵散,遂不复战,东北徙都于陈。秦以郢为南郡,封白起为武安君。”这段整体上取自《史记·白起列传》,但相比之下,《资治通鉴》少了一个细节。《史记·白起列传》:“攻楚,拔郢,烧夷陵,遂东至竟陵。楚王亡去郢东,走徙陈。秦以郢为南郡。白起迁为武安君。”“遂东至竟陵”这个细节,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秦昭王二十九年的条目中也有。但对比《史记·楚世家》:“(顷襄王)二十一年,秦将白起遂拔我郢,烧先王墓夷陵。楚襄王兵散,遂不复战,东北保于陈城”,没有“东至竟陵”的说法。因是楚事,司马光落笔的时候虽主要参考了《白起列传》,但还是依据《楚世家》删去了“东至竟陵”一节。

通过以上数例,我们看到,当世家与列传相齟齬时,司马光舍列传而取世家的案例是多见的。即便不能说是绝对原则,也应该被视为是《通鉴》弥缝纪传矛盾的常用手法。以这一标准反观屈原事迹,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:《资治通鉴》不载屈原事迹,并非由于司马光对屈原其人、其文有何特殊看法而刻意删削,而只是史料

选择的自然结果。《史记》所载屈原两次重要的政治参与,都自相矛盾,屈原因此失去了出现在《资治通鉴》里的机会。

当然,这个结论仍然无法完全解释屈原不见于《通鉴》的现象。比如《资治通鉴纲目》所补充的屈原沉江事迹,《通鉴》能补一笔也是可以的。本文的真正目的,是想通过这个案例揭示一点:重视《通鉴》的史料来源,及其取舍之意,不仅可以为很多争论不休的问题开启新思路,也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这部经典著作。

策划:

文汇报理部

执行编辑:

任思蕴 rsy@whb.cn

封面编辑:

陈韶旭 csx@whb.cn

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,关注文汇报学人

